

# 鼠疫与近代中国 卫生的制度化 和社会变迁

在近代中国，是否有过传染病流行？若有过，其规模达到何种程度？对此曾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这些举措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本书从19世纪末以后中国的鼠疫流行入手，讨论了近代中国由国家开展的医疗、卫生的制度化，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日〕

饭岛涉

著

朴 彦

余新忠

姜 滨

译

# ペストと近代中国 衛生の「制度化」 と社会変容

〔日〕

饭岛涉

著

# 鼠疫与近代中国 卫生的制度化 和社会变迁

朴 彦

余新忠

姜 滨

译

# ペストと近代中国 衛生の「制度化」 と社会変容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 / (日)  
饭岛涉著；朴彦，余新忠，姜滨译。--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19. 4

ISBN 978 - 7 - 5201 - 3858 - 1

I. ①鼠… II. ①饭… ②朴… ③余… ④姜… III.  
①医疗保健制度 - 关系 - 社会变迁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①R - 092 ②K25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7174 号

## 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

著 者 / [日] 饭岛涉  
译 者 / 朴 彦 余新忠 姜 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 目 统 筹 / 李期耀  
责 任 编 辑 / 邵璐璐 李期耀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 (010) 59367256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 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4.25 字 数：360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858 - 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7 - 0737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1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

2000年 研文出版（東京、日本）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00 by Kembunshuppan, Tokyo, Japan

## 中文版序

《鼠疫与近代中国》（研文出版，2000）发行中文版，使读者得以用中文阅读拙作，这对身为中国史研究者的我来说实在十分欣喜。在此谨向努力促成此事的余新忠教授及拨冗费心翻译的朴彦先生致上由衷谢忱。

事实上，翻译很早便已经完成，迟迟未能出版，是因我总难以抽空专心将译文再看一遍。不过，朴先生的译文极为翔实，透过其流畅的中文（这同时意味着其极佳的日语能力），读者能够知道我的论述主张，实为我幸。

本书是以我在东京大学大学院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而写成的。在此之前，我主要从事的是清末财政史研究，特别关注关税、厘金等问题，但有几个原因令我渐把研究兴趣转移到本书的主题上。从年近不惑至今，我像着了魔似的致力于疾病史研究，目前的探讨成果包括本书的鼠疫、疟疾（《疟疾与帝国》，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以及霍乱、流感等疾病。现在我探索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菲律宾及日本的血吸虫病防治对策之历史，欲在未来几年间统整研究，出版继疟疾之后的疾病史研究第三部曲。

时至今日，经过这么长的岁月，我已经很难明确详述被疾病史议题吸引的原因。就随想所及，则有几点可说。首先，疾病是攸关每一

## 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

个人生命的问题，透过这个议题，我仿佛能切身接近研究对象；其次，过去总认为殖民统治时期控制了某些传染病，因而将卫生事业的制度化单纯视为殖民统治的正面影响，然而我试图对此一看法提出批判。这个问题实为包装在卫生事业中的近代性问题，其历史的意义需要更为谨慎的探讨。我的研究与理解是从以上的问题意识出发，其是非当否，只得交由各位读者来判断。

我曾于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国留学，在北京、上海各生活了一年，借由这段经验，我认识到对中文的研究成果提问及对话之重要性。此外，在研究过程中，我阅读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史料，受到许多大陆、台湾的大学老师和学生的帮助。本书的出版，可说是更进一步实现了上述的提问及对话，此外，也许也能聊表寸心，回报在我留学与研究生涯中帮助过我的许多人。

时光飞逝，留学至今已匆匆过了三十载，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这期间的变化实在非常大。然而，同时我亦感受到最深层的中国特性。目前我的研究范围不只是中国，还跨及包含韩国的东亚与东南亚，在研究过程中，我偶也留意到中国社会拥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21世纪的现在，应该是越来越渴求率直讨论此一看法的时代，本书若能有任何帮助，喜悦将莫此为甚。

收笔之际，再次对协助出版本书的全体人员致以最深的谢意。是为中文版序。

涉岛饭

2018年10月

## 目 录 Contents

序章 传染病、卫生、国家 .....	1
<b>第一章 腺鼠疫的国际化</b>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	19
第一节 1894年的腺鼠疫流行 .....	22
第二节 1900年的夏威夷黑死病事件 .....	33
第三节 1902~1913年的横滨 .....	36
<b>第二章 腺鼠疫的流行与卫生的政治化 .....</b> 42	
第一节 1899年营口的腺鼠疫流行 .....	43
第二节 卫生的政治化与近代中国的卫生行政 .....	55
<b>第三章 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与腺鼠疫及疟疾 .....</b> 73	
第一节 近代日本的卫生行政 .....	74
第二节 腺鼠疫的流行与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 .....	82
第三节 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与疟疾 .....	98
<b>第四章 东北的肺鼠疫流行</b>	
——1910~1911年 .....	108
第一节 东北的肺鼠疫流行 .....	109
第二节 清政府的应对 .....	111
第三节 北京、天津、上海 .....	127

# 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

## 第五章 肺鼠疫的流行和卫生的政治化

——1910~1911年 ..... 137

第一节 “关东州”、大连的卫生行政 ..... 138

第二节 肺鼠疫防治措施的开展 ..... 149

第三节 碧山庄苦力收容所 ..... 158

## 第六章 民国初年卫生的制度化

——以中央防疫处为中心 ..... 165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卫生行政 ..... 166

第二节 中央防疫处的设立 ..... 173

第三节 卫生行政的展开 ..... 179

## 第七章 1919年的霍乱流行 ..... 187

第一节 霍乱的流行 ..... 188

第二节 上海、哈尔滨、横滨 ..... 194

第三节 中央防疫处对霍乱的应对 ..... 202

## 第八章 卫生制度化的国际契机

——新加坡传染病情报局的设立 ..... 208

第一节 近代中国和检疫 ..... 209

第二节 国际联盟和新加坡传染病情报局 ..... 212

第三节 卫生和国际秩序 ..... 220

## 第九章 卫生的制度化与检疫权的收回 ..... 229

第一节 《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与卫生行政 ..... 229

第二节 卫生的“国家化”及检疫权的收回 ..... 235

第三节 近代中国的卫生制度化 ..... 240

目 录

补论 近代东亚的传染病流行 .....	249
第一节 近代中国 .....	251
第二节 台湾、“关东州”、桦太、朝鲜、南洋群岛及日本 .....	255
第三节 近代东亚的传染病流行 .....	262
终章 近代中国的卫生制度化与社会变迁 .....	333
参考文献 .....	340
后 记 .....	374

# 序 章

## 传染病、卫生、国家

### 一 本书的课题

本书将致力于阐明近代中国的传染病流行状况及其历史背景，同时对近代中国社会如何应对传染病流行及其在近代中国历史中所具有的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近代中国是否有过传染病的流行，如果有过，其规模曾达到何种程度，又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除了少数的例外，至今大多没有得到阐释。故就此意义而言，揭示历史上传染病的流行状况，并就社会对传染病的应对情况及其特征进行探析，乃是一个填补研究空白的重要课题。

本书之所以在一系列的问题中，将对传染病流行的应对，特别是卫生事业的推广作为研究课题，是因为在近代世界，卫生事业的开展已成为各个地区统治机构重组的契机，对社会制度的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 19 世纪以后的欧美诸国和日本，各种传染病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及殖民主义的扩张而流行。对此，在以自来水为表征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推进的同时，国家加强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参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就是所谓由国家推行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化（欧美学术界称之为 state medicine, state hygiene）。其结果是国家干预个人生活的范围逐

## 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

渐扩大。但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化当然不仅在欧美诸国、日本得到了推进，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展，卫生的制度化也在被殖民地区强制执行，对殖民地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自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同样的问题对近代中国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影响。

本书将把 19 世纪以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所谓近代的时代特征，放在国家开展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化——本书所特别侧重的是卫生的制度化——的过程中来加以探究。面对学界有关近代中国社会的两种认识体系，即中国社会在受到西方的冲击，出现了制度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同时，在同日本进行的战争中，经历了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体系，<sup>①</sup> 以及暂时将“国家建设”置于背景之中，从中国社会特别是民间社会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状态及其多样性的认识体系，<sup>②</sup> 笔者认为卫生事业的演进十分鲜明地显示了近代世界里中国的社会构造及国家特征，冀通过相关分析，能够针对上述的认识体系提出问题。

近年来，近代中国的研究状况，特别是日本的研究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广被认可的一点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不能作为“西方（或日本）的冲击”的变量来理解，而要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构造，也就是说，相对更关注“历史的连续性”而非“历史的断裂性”，对理解中国近代历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sup>③</sup> 这一研究视角变化的背景是，在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之中，以美国为中心的欧美的近代中国研究也对日本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sup>④</sup> 另外，利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以及田野调查的成果所做研究的进展，也使史学性的分析不得不重新将中国的社会构造置于

① 通过呈现以国民国家的建设为目标的“国家建设”的过程来分析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有很多，其代表为西村成雄（1991）。

② 该认识的代表为滨下武志（1997）。

③ 对此视点予以强调的是沟口雄三（1989）。

④ 众所周知，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由柯文将美国的近代中国研究成果，包括对其方法的讨论进行了系统性的介绍。柯文所提倡的“中国中心观”（第 224 ~ 225 页）对日本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参见佐藤慎（1993）。

近代中国的历史之中来进行考量。

在这种状况下，可以说近年的研究集中关注的是“历史的连续性”，即“不变的中国社会”。当然，研究的对象和视角是多样的，不能一概而论，但对“不变的中国社会”的关注，也缘于在以改革开放为旗帜的中国的政策转换之下，今日中国社会的状态中隐现出与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共通的要素。<sup>①</sup>当然，在长时段的历史中，这种“不变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是理解中国社会的特征的有效视角。近年的许多研究将近代中国的历史构造的特征从多种视角加以阐明，所关注的方面也由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及革命史集中转向社会史，这不仅是因为实证性研究的进展，也与近代中国历史认识框架发生变化，特别是对其中“历史的连续性”的高度关注这一背景密切相关。但是因为近年的研究过于关注“历史的连续性”，又出现了对中国社会应对近代世界所展现的意义有所轻忽的倾向。近代世界与此前的时代相比，是相当具有均质性和同时性的，这是因为西欧创立的制度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被强行引入非西欧世界。当然这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抗，但这反抗本身也必须以近代世界所具有的意义为前提。本书将这种支撑近代世界的均质性、同时性的制度称作“近代性的构造”。<sup>②</sup>

毫无疑问，近代中国也是近代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此意义而言，在21世纪的现在，如果把时间的坐标设定为“20世纪的中国社会”，由此来看中国这个国家和人们的意识、社会生活的状态的话，可能会看到它的广义上的社会制度、社会构造的变化比起其他各国反而更大。那么，这种社会制度、社会构造的变化，是通过何种逻辑以及契机而得以实现的呢？本书认为，具体地探讨所谓近代的时代性对中国社会是否有过影响，如果有过，有过何种影响等问题，对于探讨近代中国的历史来说，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的研究表明，在近代中国，人们实际上已经选择了表现为近

<sup>①</sup> 如有对中国征税制度进行了历史通观性把握的，参见岩井茂树（1994ab）。

<sup>②</sup> 所谓“近代性的构造”，参考了今村仁司（1994）之说。

代化的诸多方向。即以“近代性的构造”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为前提，将中国社会的应对放在近代化的脉络之中来进行探讨。在那些研究中，中国的近代化多被认为是人们的生活从封建性旧制（但这里所谓封建性旧制的意义不同于欧洲的封建制，而等同于“旧制度”）及19世纪中期以后欧美诸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入侵中被解放出来，取得民族独立，建设近代国家，以及为了经济成长而实现工业化的过程。这样的理解虽有一定的解释力，却将解放及工业化理解为中国社会近代化具体内容，特别是将其理解为中国社会“近代性的构造”的具体对应。

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中，“解放”的意义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后的社会主义化所代替的情形。这是受到了强调这一历史解释体系的中国方面影响的结果。另外，虽也有与此不同的表现出批判社会主义化的理解，但可以认为这种理解也通过批判本身，与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共享“解放”的含义。这还明显表现在探讨20世纪末中国政治的课题时经常使用的“民主化”一词上。此外，在工业化的问题中，将相对较晚实现工业化的近代中国与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用比较史学的方法进行探讨的重要性得到了显现。<sup>①</sup> 将近代中国的历史放在近代化的意义层面之上进行分析的研究所提示的问题多种多样，并取得了许多实证性成果。然而，对中国社会所面对的所谓“近代性的构造”，仅如前文所述放在解放及工业化的意义层面理解算得上全面吗？而且，仅将作为历史继承体的当今中国社会置于解放和工业化的方面进行理解，就能够把中国社会的构造置于“历史的连续性”之中加以探讨吗？

在此种情况之下，滨下武志将解放、工业化等问题作为背景问题

<sup>①</sup> 久保亨（1991年第一版、1995年第二版）以棉纺织工业为中心对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探讨。他在日本的经济史研究及工业化历史的脉络中，对战后日本学术界的重大论题“亚洲（中国）停滞论”进行了批判。而且久保亨（1999）以同样的视角，以对外关系为中心对1930年前后国民政府关税政策的演变进行了探讨。

考虑，在关注“历史的连续性”的同时，从以朝贡（贸易）体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贸易网络的推广以及更为立体的地域设定即所谓“域圈”出发，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他的一系列的研究，<sup>①</sup>为战后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以历史的长期视角，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NIES（新兴工业国，即“亚洲四小龙”——译者注）、ASEAN（东盟——译者注）的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而对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中国经济显现活力背景的论述，将“国家建设”和工业化等问题相对化了。

然而，重新分析有关近代中国历史中的解放、工业化，或是与之相应的体系，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面对的“近代性的构造”所提出的系列问题中，仍有些未被作为研究对象。滨下武志看到了海关似乎是介于国家和民间之间的机构，并在机构方面对近代的行政、财政机构的状况进行了分析。而因为他将国家放在分析背景的位置上，分析对象的中心逐渐转化为非制度化的民间社会所拥有的纽带——贸易网络上面。这样处理的结果是民间社会所具有的纽带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构造及社会构造的变迁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这一问题未能得到揭示。而且，近年的社会史研究虽然对近代中国社会构造的特征从多种视角进行了探讨，<sup>②</sup> 在方法上也具有社会史研究的特征，却并没有明示其阐释的事实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具有怎样的意义。

这说明再一次从国家及权力机关，即广义的社会制度变迁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历史重新进行探讨是必要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虽说是政治史的复归，但并非只将权力构造及其变化的过程自身作为探讨的课题。“近代性的构造”的重要要素中，包含着近代世界中国家的理想状态，尤其是国家和个人由何种关系相联结，以及为此而存在的社会制度化等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再一次从社会的制度化历史脉络出发，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做一探讨。

---

① 滨下武志（1989、1990、1997）

② 有关社会史研究的相关成果，小浜正子（1995）的论著有较为详尽的介绍。

在这方面，近年来，由于地域社会论或有关都市社会的研究对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乡绅及同乡团体、同业团体等民间团体，乃至 20 世纪初大量产生的起到国家和个人之间中介作用的商会、自治会等中间团体的作用的关注，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构造及社会构造的理解呈现出多层面的态势。<sup>①</sup> 20 世纪初是通过清末新政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方面最早正式试行改革的时代。同时，根据杜赞奇的说法，这一过程“是为了近代化而创建国家机器的最早的重要探索，而缺乏统驭社会的能力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官僚机构的周围进行社会资源的动员。因此，反而使介于国家和民众之间的行政经纪人飞扬跋扈，结果导致了与最初建设‘强有力的国家’目标的背道而驰”，是“国家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这是因为其与“国家政权建设”（state making）之间被认为有互为代替的关系〕的过程。<sup>②</sup> 这就是说，以地方政府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正在试验之中，由于支撑它的乡绅及商会、自治会等中间团体势力的扩大，其与清政府之间的利害调整变得困难，遂成为导致辛亥革命的动因，以及袁世凯政权覆亡以后出现地方割据局面的历史背景。村田雄二郎将此过程理解为地方精英（乡绅）“绅权”的扩大、延伸，乡绅“在官僚—公权力的默认与支持下，在得到一定的权限的同时，还参与了税粮征收、治安维持等的行政事务，并负责水利土木、教育慈善、救荒备粮等公益活动”。他通过与前文所引杜赞奇的观点的对话，提出有必要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出发来探讨近代中国社会构造。

但是，这里的重点在于，20 世纪初的中国，即便制度改革的探索带来了与清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作用，但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建设“强有力的国家”目标的确立，或者说，是什么造成了将国家视为动员有关资源的装置呢？20 世纪初，清政府将此前民间社会所承担的

① Esherick and Rankin (1990).

② Duara (1988), pp. 73–77. 杜赞奇学说的概括参考了村田雄二郎的论著 (1995)，第 265 页。

各种负担转换为税收，通过制度化介入民间社会，即以近代国家式的统治形态作为行动的目标。以往的研究往往把重点放在对由新政所展开的制度改革的近代性的探讨上，<sup>①</sup> 或者放在对要求清政府改良政治体制的立宪运动及以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派的政治构想的近代性的探讨上，<sup>②</sup> 而为什么制度改革以近代国家式的统治形态为指向这一问题却几乎未受到关注。这说明生活在 20 世纪的我们因为接受了近代国家式的统治形态，没有将其自身的历史性作为问题来对待。<sup>③</sup>

在近代的世界里，欧美诸国及日本将教育、医疗、卫生、扶贫等事业作为征税的事由而使其制度化，在使国家的功能膨大的同时，亦将其作为国家行政的一部分来加以推行。比如日本，常常将此过程作为近代化来理解。其中，医疗、卫生事业的运作是国家最积极介入的领域，特别是卫生事业的确立，因为它是有关个人身体的领域，故成为实现社会组织化、“身体纪律化”等的统治机构重组的契机。<sup>④</sup> 这类统治机构的近代化首先出现在西欧，自 19 世纪后期起，日本也开始积极地引入，如后文所述及，在殖民地统治中，同样以这一方向作为目标，因而对遭受殖民地化的地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书之所以对近代中国的卫生制度化过程给予关注，就基于上述原因。而且，近代中国卫生制度化的进程，对 19 世纪末以后的传染病流行特别是鼠疫（腺鼠疫、肺鼠疫）的流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以往的研究几乎没有注意到，但实际上在鼠疫的流行逐渐表面化的过程中，近代中国通过欧美及日本的殖民者在侵入中国之时推行的卫生事业，开始直面“近代性的构造”，并最后采行了卫生的制度

① 村田雄二郎（1995），第 263～266 页。

② 如清末新政过程中设立的实业振兴官厅，对商部（1903）、农工商部（1906）的议论都是其典型。参阅曾田三郎（1975）、仓桥正直（1976）。

③ 西村成雄（1991）。另外，深町英夫（1999）的研究从“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行了探讨。

④ 参阅见市雅俊（1990）、成田龙一（1995）。“身体的纪律化”的用语，于此借鉴了见市雅俊的研究。

化。揭示卫生制度化的具体过程，分析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正是本书所欲处理的课题。

## 二 传染病的流行和卫生制度化

传染病的流行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将此作为问题提出以来，<sup>①</sup> 已为很多的研究所关注。也就是说，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传染病一旦出现流行，就不仅会对人口动态产生影响，还会成为社会制度及人们的意识、规范发生变化的动因。欧洲中世纪的鼠疫（黑死病）流行即为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例。<sup>②</sup>

传染病的流行，还存在全球性蔓延的问题。16世纪初，天花对西班牙将南美洲占为殖民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由于南美洲没有天花，西班牙人所带去的天花令南美洲人口锐减，从而让西班牙人比较轻松地将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将此大航海时代以来因为人的移动及商品流通的扩大所带来的致病微生物的交流称作“哥伦布的交换”（Columbian Exchange），认为这对殖民主义的展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sup>③</sup>

这正如富士川游在《日本疾病史》中所指出的，“疫病的发生关涉社会状态的变动，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及伦理产生影响的情况并不少见。约略言之，因为国民发展的消长与传染病的发生往往相伴而行，故疫病学与人类文化的历史紧密相连、互不可分”。<sup>④</sup>

① 麦克尼尔（1985）。笔者之所以对传染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产生兴趣，就是因为该书中几乎没有对中国社会的事例进行整理。

② 村上阳一郎（1983）。村上认为，“庄园制度的变化是被黑死病所促成的这样的历史性的因果关系的设定明显是错误的，而认为黑死病的流行并没有对此变化产生决定性作用也明显有误”（第160页）。

③ クロスビー（1998）。不过，虽对天花对南美的殖民地化所产生的影响予以承认，但依据对原住民人口的规模大小的不同认识，研究者对其影响程度的看法并不相同。阿诺尔德（1999），第116页。

④ 富士川游（1912年初版，1969），第3页。